

ZHONGGONG SIDA YISHI

中共四大轶事

李蓉 叶成林◎著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ZHONGGONG SIDA YISHI

中共四大轶事

李蓉 叶成林◎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鲁 静

责任编辑:刘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四大轶事/李蓉,叶成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01-015291-2

I. ①中… II. ①李…②叶… III. ①中共四大(1925)—史料

IV. ①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6016 号

中共四大轶事

ZHONGGONG SIDA YISHI

李 蓉 叶成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321 千字

ISBN 978-7-01-015291-2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引 子.....	1
一本“口袋书”	2
中共四大召开的背景.....	4
毛泽东签署的大会通知	10
中共四大代表的产生	16
筹措大会经费的艰难	22
中共四大前的准备	27
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35
李大钊率团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39
推动国民会议运动	48
中共四大时的党员人数	51
哪些代表出席了中共四大?	55
关于出席中共四大代表的探究	60
出席中共四大的青年团代表是谁?	71
上一届中央委员如何参会?	76
占 20%的工人代表	83
一份初步确定的代表名单	87
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	90
参加中共四大的唯一一位外国人	95

参加中共四大的工作人员	97
一封让人疑惑不解的信	101
代表的集中及其食宿	104
中共四大会场的考证和确认	106
大会的概况	109
没有找到原文的大会政治报告	113
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和决议	116
大会的讨论与争论	118
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120
张申府在会上的发言	127
会场的布置和气氛	131
检讨过去组织工作的缺点	134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136
关于工农联盟	142
最有价值的议案	144
和国民党的关系及策略	149
“一个伟大的决定”	152
关于中共四大党章	157
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文件	161

第一次提出组织党团·····	164
第一个宣传工作决议案·····	169
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	173
职工运动与民族运动之关系·····	176
职工运动与中国共产党·····	179
职工运动的任务·····	181
强调党对青年运动的指导·····	184
青年工作的三方面·····	187
党和团组织的密切关系·····	190
各地设立妇女部的规定·····	192
大会的选举·····	196
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四大·····	200
大会后加强党组织的任务·····	206
向中共旅莫支部报告大会情况·····	208
张伯简给东方大学同志的信·····	211
青年团三大的筹备·····	214
青年团三大的召开·····	218
对青年团三大的评价·····	224
中共四大的“重大进步之一”·····	227

中央组织部的工作	230
中央宣传部的任务	233
选拔留苏学生	234
扩大国民党左派	238
关于“大革命”的称谓	241
中共四大后各地党组织的发展	247
强调共产党的职责和任务	254
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幕	258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	260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爆发	265
两湖地区的工人运动	267
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	270
“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在中国的的影响	275
党员队伍继续扩大	278
北方党校的创办	280
五卅运动后党在湖南党的工作	283
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工作	285
山东:发展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之一	289
广东党、团组织的工作	291

四川地方党组织的恢复·····	293
中共旅欧支部的工作及结束·····	295
中共四大后的中央机关工作·····	300
周恩来谈中共四大·····	304
蔡和森对中共四大的评价·····	308
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谈中共四大·····	313
郑超麟对中共四大评价·····	316
尾声·····	319
主要参考文献·····	320
后记·····	323

引 子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于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28年中,先后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尤其是建党初期,基本上是一年一次,1921年、1922年、1923年,分别召开了党的一大、二大、三大。到1924年,按理应该召开党的四大。但由于时局变化和其他原因,四大推迟到1925年1月才得以召开。

中共四大,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此前的一大、二大,都是上海召开。上海,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取得全国胜利的28年历史上,唯一一个举行过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城市。除了三次在上海外,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七大则是在陕西延安召开。

中共四大的最大贡献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思想。应该载入史册的,不仅是这次大会的最大贡献,而且也应该包括和这次大会相关的许多人和事。因为有了这些人和事,才有了中共四大的历史贡献,也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一本“口袋书”

位于上海虹口区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展品中有一本纸张已经发黄的小册子，大小为35厘米×9厘米。这是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是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典型的“口袋书”。这本“口袋书”的封面是竖排版，写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五年二月印”。

这是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那段历史的见证。在九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本小册子承载着哪些信息，诉说着什么样的历史呢？

这份重要历史文献，最初展览在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内。2005年1月11日，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80周年纪念日。中共四大史料展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内开展。当时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有关人士表示，在多伦路的二期改造中，将考虑在中共四大原址建立中共四大纪念馆。

中共四大的会址具体在何处？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晓。因为中共四大原会址的房子，在20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战争中被炸毁，已荡然无存。由于这个原因，经过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有关同志的多方征集、多年考证，最终确定中共四大原址在现在的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

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1987年4月25日正式确认这一地址。后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原址立起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1925)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布为纪念地点

寻觅中共四大会址的工作历时三年多，经历一番周折，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

关于中共四大的会址，出席大会并担任会议记录的郑超麟回忆说：那

时,他住在静安寺附近,乘电车到四川北路横浜桥下车,从川公路进去,走到会场。另外还有两条路线可以走。这三条路线他都是走过的。当年他在会上除了做记录,就是当向导,把代表带进会场。这个开会的地方很安全,开了11天会,没有发生过任何破坏。^①所以,当有关部门请他帮助认定中共四大会议址时,郑超麟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实地踏勘,认定当年四大开会的地点,是在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弄堂里的一座三层楼的二楼。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的一幢石库门房里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名党员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参加大会,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第三届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中共四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从理论上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加以系统化,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会议还通过了11个决议案、2份宣言以及其他文件。

中共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领导,强调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后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形成了新的局面。总之,中共四大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它也是真实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足迹的一个亮点。

有学者认为中共四大通过的决议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大会从政策上、思想上武装了全党,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重要准备。大会闭幕后,中共马上发动了二月罢工,紧接着爆发的五卅运动更是举世震惊,大革命迅速掀起高潮。^②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② 本书编委会:《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

中共四大召开的背景

中共四大召开于1925年1月的上海。这时的中国是什么状况？也就是说，中共四大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如果把上面的题目当成一扇窗户，我们可以用开阔的视野，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社会；从共产党内到党外，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北洋军阀段祺瑞，从各个方面和角度，探求中共四大召开的大背景。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各派军阀中，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最强。他们在英、美等国支持下，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北洋政府。1923年3月，他们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加紧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再次挑起军阀混战。到1924年，参加军阀混战的兵力达45万人，战火燃遍了全国大部分省区。随着军费的激增，大小军阀统治区内巧立名目，增收捐税，滥发纸币，肆意搜刮，致使经济萧条、生灵涂炭。

1926年，蔡和森在旅莫支部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概略地介绍了中共四大召开的背景。他指出：“这时中国的政治情形已渐渐革命化，一方面恢复了中俄邦交，一方面使反直系战争爆发，在南方又发生商团事件，这些事实都是革命的表现。自江浙战争发生后，于是引起直系的反奉战争，而在这时发生北京事变，冯玉祥从直系分裂出来，走上革命的道路，吴佩孚的势力消灭，因此全国民众运动又渐兴起来。这时，全国民众的口号是‘召集国民会议’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样一来，但召集国民会议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畅快地向前发展。”^①

蔡和森从南方广东的政治情形讲到北方的政治形势，从工人运动的情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0页。

况到农民运动在广东的很大发展,接着讲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简而言之,当时中共四大召开的主要国内背景之一是国共合作开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

一年多前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方针。中共三大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大会的主要议程便是讨论和决定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按照大会精神,中国共产党“应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同时注意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中共三大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各地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开幕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确立是国民党一大的主要贡献。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名,其中有20多名共产党员,如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等。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李大钊被指定为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协助孙中山主持大会。

这次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被称为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包含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内容和新精神,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经过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努力,国民党一大通过了有关宣言、决议和纲领。1924年1月28日,共产党人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讲话:“我个人及一班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及态度,诚恳地讲几句话。兄弟们到广州来,承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欢悦的接受,令我们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尽其绵薄的机会,我等不能不敬服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热诚的促进负有国民革命的使命的国民党的精神。”

“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地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

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团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

“总之,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

“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①

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人约占了四分之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少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如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部长,林伯渠担任农民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秘书,彭湃担任农民部秘书,杨匏安担任组织部秘书。孙中山在会上发言中专门谈了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为了保证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推动国民党的改组,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前于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联席会议,组织了一个有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等参加的领导小组,领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从北京前往广州的李大钊正好路过上海,因而出席了这次会议。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全国各阶层人士和工会、农会、学联、商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开展国民议会运动,随后又开展声势浩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党员分赴各地开展工作。国民党的组织空前发展,革命的影响和革命的力量迅速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

在国共合作的格局下,怎样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进一步推动国民革命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6页。

的深入发展,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需要讨论和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前,因为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国民党的倾向。为了总结经验,确定以后的工作方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并以这个政纲做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斗争。陈独秀在会上还表示:党的三大后中央决策多取决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会议予以检讨。^①

会议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会议改变了党的三大要求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指出:“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会议还就党、团关系问题,党内组织、宣传教育问题,以及在农民、士兵间的工作问题作出决议。这次会议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如何通过国共合作进一步推进国民革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924年7月21日,陈独秀以委员长名义和秘书毛泽东共同签署《中央通告第十五号》,要求各地党组织作好与国民党分裂的组织准备,指示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应采取的策略。9月7日,陈独秀在给魏金斯基的信中,要求实行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路线。

^① 中共三大后的中央委员,有四个常驻地方:京、粤、鄂、湘。在中央局任秘书工作的毛泽东,也奔走于沪粤之间,做国民党的工作,多半时间不在中央(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便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委托回到长沙筹建国民党,此后中央局秘书一职便由罗章龙接任);蔡和森对国共合作政策持保留态度,只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瞿秋白除在广州帮助国民党改组耽搁一个长时期外,又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因此,陈独秀许多事往往不经过会议而直接决策,形成长作作风。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写:《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而到8月27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寸铁”栏发表《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一文,宣称“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民众若不认识国民党和国民党若不认识自己,都是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

10月10日,陈独秀遵照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精神,致函魏金斯基,再次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可见,共产党内对和国民党的合作很是不满意。

此时的国内局势却不断变化。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齐燮元和卢永祥双方的战火,引起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统治的北洋政府,囚禁曹锟,重组内阁,邀请孙中山北上。11月24日,段祺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围绕孙中山是否北上,中国共产党内意见不一。广东区委支持孙中山北上,认为孙中山北上,可以将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发展。而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陈独秀和彭述之、蔡和森等人反对支持孙中山北上,认为孙中山此举是“军事投机”,“与段祺瑞妥协”,主张孙中山留在广东,巩固革命胜利。^①

但是,陈独秀等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态度很快就有了调整。11月6日,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表示:“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②

此时,中共中央虽然不再反对孙中山北上,但对孙中山仍多有批评。11月19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二号指出:孙中山的宣言“纯粹代表国民党中派的观念,措词含混,大有与各军阀妥协之余地……并无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要求”,表示中央要发一宣言,向孙中山提出政治的具体主张,同时指示各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报纸上在城市农村向民众游行演讲,宣传党的主张,促成国民会议实现。同日,中共中央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宣言,一方面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及其政治主张,一方面再次强调解决目前危

^① 参见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机的方法“只有”国民会议,并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为未来临时政府和国民会议的十三条政纲。^①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把持黄埔军校不满意,因此于11月向苏联顾问鲍罗廷建议:停止支持黄埔军校,因为该校已被右派把持。而国民党中央并不赞成把国民党“强分为左中右派”,还为此攻击和“警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1月19日,《向导》记者发表《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文,批驳国民党中央的“警告”。

此时,国共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孙中山偕宋庆龄北上的举动,更是引起了全国的关注。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到达上海,接受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宣布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治主张。21日,孙中山离开上海取道日本经天津,于12月31日扶病到达北京。

在这局势多变的当口,要不要退出国民党,能不能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作出决断,并非易事。在国共合作实现并取得进展,同时又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局势下;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三年多,党的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按照党章规定,应该一年举行一次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

^① 参见《向导》第92期。